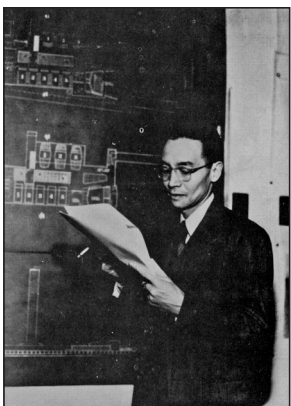


## 雨露滋润 铭记师恩

### ——纪念先师梁思成先生诞辰 120 周年

○奚树祥（1958 届建筑）



在一九四七年，梁思成先生在纽约国际建协介绍联合国大厦设计方案的现场。

我1952年入学清华，是院系调整后建筑系招收的第一届学生。中学时大家都怀着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，所以大多数同学都报考理工科。学生们当时已熟知梁思成先生大名，慕名报考清华建筑系的同学不少，仅我所在的杭州高级中学，这一届就有四名考取。

进了清华后却很少有机会见到这位名满全国的教授，他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，但有关他的种种传闻却影响了我们整整六年。当时“中国建筑史”的授课老师是莫宗江教授，辅导老师是黄报青、李承祚。

梁先生从来不把自己当作“神”，但他确实像神一样立在学生们的心中：任公长子、梁林佳话、营造学社、保护古都、清华创系、古建研究、李庄生活、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……这些都打动着我们年轻人的心，对他十分崇敬。

系里偶尔有活动，我们才有机会见到这位身着中山装、手执拐杖、腰背微驼、笑容可掬的长者。有一年埃及建筑师代表团访华，团长被请到清华来演讲，起初汪坦老师任口译，过程中，梁先生可能感到汪老师的翻译忠实有余而生动不足，于是主动要求代劳。他语言幽默诙谐，成语信手拈来，令所有在场的师生都深为折服，不断爆发出笑声、掌声。埃及教授也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。这是我在清华求学六年，唯一一次领略他的风采。

梁先生对年轻人爱护有加。1958年北京设电视台，次年要召开第一届全运会，系里许多青年教师缠着梁先生，要他送一台黑白电视给系里。这在当时属于高档消费品，对梁先生这样的一级教授，也属价格不菲，但他竟也慨然应允。

从清华园到东华门路途遥远，当时要乘学校烧木炭作动力的班车，周末进城很不方便。梁先生回国时带回一辆被学生称作“小臭虫”的Chrysler轿车，开始自己开，后来送给清华，进城由学校派司机接送。青年教师经常“揩油”，搭他的便车。梁先生好说话，来者不拒，所以每次进城，小车都超载，挤满了年轻人。梁先生后来提起此事时笑着对我说：“开始我的小臭虫夹带‘小黄鱼’，后来大家都变成了沙丁鱼。”梁先生说话向来幽默风趣。

无疑，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大师，但

他更是一位有人情味、通人性的普通人。因为他的谦和，总能看到别人的长处，所以特别能团结人，上至领导下到售票员、小商贩，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。

1959年，我回母校建筑历史教研室进修，有幸随侍他将近两年，从没有听他说过任何人的不是。他爱才如命，惜才如宝。高庄教授性格孤傲，在系里有些落寞，梁先生有一次在教师会上说：“高庄教授有学问，从我起，大家让他三分。”这种气度和胸怀，使他团结了一大批优秀教师，使清华建筑系人才荟集，如吴冠中、关广志、刘致平、莫宗江、吴良镛、汪坦……抗战时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约而同地先后都投奔了梁先生，成为初创清华的教学骨干。

我在母校进修期间的指导教授是赵正之先生（名法参，字以行），但同时受学校安排，担任梁先生的助理，因此也有幸忝为他的学生。赵先生对元大都深有研究，但身体欠佳，所以我和梁先生的接触反而较多，除了进修外，还从系里代他收取工资和信件，基本上两三天就要去12公



建筑历史教研组开会。右起：奚树祥、莫宗江、吴光祖、赵正之、吴焕加

寓他府上一次。那时林徽因先生已谢世四年，梁先生还没有续弦，子女都不在身边，困难时期朋友们很少走动，学生们忙于功课，所以这段时间他非常寂寞。我就成了与他接触比较多的少数人之一，也因此有幸更多地受教于他。

## 艺术大师

梁师是一位建筑大家，同时也是一位精通绘画、雕塑、戏曲、舞蹈、音乐的艺术大师。我看过他1940年代画的建筑画，用笔流畅，挥洒自如。谈起古典音乐和音乐家，他都能如数家珍。

他常说：“不崇尚美、不追求美的建筑师不可能创造出美的建筑。”他认为美渗透在生活各个方面，他虽不像朱光潜、蔡仪等美学家那样擅长理论，但他的生活美学感悟很深。和梁先生相处使我逐渐懂得了生活美学，知道了“处处留心皆学问”的道理，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和领悟。

梁先生精通传统的金石书画，有一次他拿出一件汉代明器和一张唐代陶俑图片要我分析。他给我上课时，常拿出汉阙、石刻、经幢、碑亭、石桥、华表、牌楼等图片，分析它们的造型和纹样，告诉我它们的年代特征。梁先生上课妙趣横生，喜欢引用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之类的诗词来解说建筑与环境的关糸。他的教化使我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和书本里没有的知识。

人大、政协常有庆祝或招待活动，每次送两张券，梁先生当时是单身，所以有时会带我参加。我曾见到周培源、张奚若、华罗庚等许多名人，他们误以为我是梁先生哲嗣从诚，有一次民盟“七君子”

## □ 怀念师友

之一的史良先生又一次追问，引得他哈哈大笑，回答说：“他不是小犬从诚，是我的小助教。”

梁先生有一个评论的习惯，每次利用演出中场休息时，会在节目单上写下他的评论，他对音乐、表演，甚至演员的服饰、颜色搭配和舞台美术都有许多自己的看法。

有一次他带我去民族文化宫看芭蕾舞剧《鱼美人》，中场休息时，对我小声“吐槽”说：“张肖虎写的舞曲缺乏‘知鱼之乐’。”观演过程中，他特地把自己的小望远镜递给我，要我观察舞台上的演员，“你看她们的脖杆儿很美。脖杆儿对人体的比例很重要，太短太长都不行”。梁先生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美的精鉴，在审美问题上敢于直抒己见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但正是这些追求和他率真的性格，日后给他的命运带来了灾难。

梁先生博学多闻、兴趣广泛，听他谈天说地是一种享受。他谈学术能举重若轻，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、趣味化，令听者难忘。例如他发现我常搞错清朝的年号，便教我口诀“努尔哈赤皇顺康、雍乾嘉道咸同光”，朗朗上口容易记住。

梁先生对北京城和故宫布局极为熟悉，形容故宫是中国的一座“高级监狱”，说有文字记载可查，每年修缮都要失踪几名工匠——他们是被宫女们私“藏”，最后又遭灭迹。他告诉我在北京一定要去逛大栅栏，体会那里的市井文化；去颐和园时应注意后山、后湖，说这一带的布局非常精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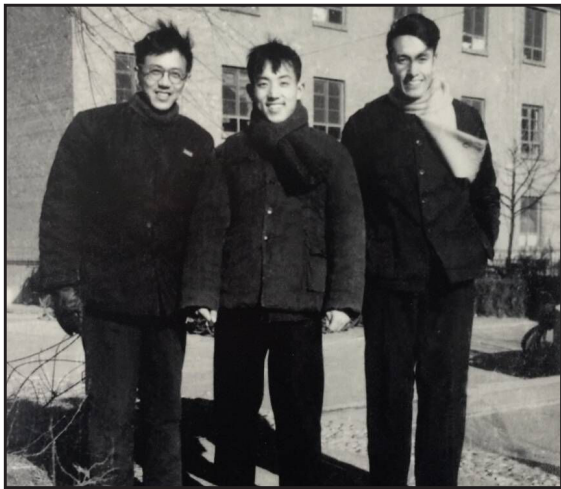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回讨论藏式建筑，梁先生特

意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，例如当年文成公主是怎么进藏的，她对西藏文化的贡献。他要我去承德参观外八庙，于是我去了承德五天，回来后要我谈见闻和参观心得。我记得还有一次他谈到中国历史上拓跋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。

他在分析故宫布局时，要我从满清的礼仪制度、家庭结构和宗教信仰等几方面入手。后来我在波士顿大学接受“再教育”，写论文时就用了梁先生的这一套方法。

1960年夏天，在建研院召开有关中国建筑史稿讨论会，学校派我和吴光祖参加，我们在会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，引起争论。回到学校梁先生听我说了情况之后表示，他们为出版这本书已经讨论了好几稿，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，年轻人参加这种学术会议应该多听、多看、多学习，学术上要尊重刘敦桢先生的意见，把我批评了一顿。

他指导我的重点在于研究方法和工具书的利用。他要我多读《资治通鉴》，研究中国建筑必须静下心来读史料，说拾别



清华进修结束时，同寝室欢送奚树祥（中）

人牙慧成不了“大家”。他发现我的古汉语基础不够扎实，读典籍有一定困难，于是指示我补课，要我“十年磨一剑”，说这是“打基础的活儿”。这对我后来研究《中国旅邸考》帮助极大。在他身边的两年是我在建筑史领域最长知识的两年。

### 仁者爱人

梁先生对规划教研组程应铨老师一直非常欣赏。他从美国回来后对城市规划有了新的认识，对程老师的工作更加重视。程老师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，是吴良镛先生的同班同学，他才气横溢，英、俄文都很好，1956年跟梁先生一起访问波兰，考察战后波兰的城市建设，回来后又开始自学波兰文。当时国内的城市规划大学教材就是他编写的。十分不幸，程老师因为支持“梁陈方案”以及为陈占祥、华揽洪被批判鸣不平，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。梁先生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。程当时和我同住一个公寓同一层楼，他孤身一人住一间，很少与人往来，所以梁先生有时会向我了解程老师的近况。我曾受梁先生嘱托，特地上门看望程老师两次。知道程喜欢集邮，梁先生细心地让我将他搜集到的外国邮票带去给他。梁先生的关心和惠赠令困境中的程老师深受感动，一再嘱我回谢梁公。

梁先生对清华在“反右”运动中落难的教授们也很同情。钱伟长1950年代初曾在苏联《星火》杂志上发表过有关中国建筑的科普文章，当时系里有人讽刺钱为“万能博士”，对他“跨界”有非议。我和梁先生谈起此事，他反问：“大家都来关心中国建筑是值得高兴的，钱先生跨界有什么不好？”当我告诉他前几天看到钱

伟长在教工食堂帮厨卖啤酒，以及听到在“除四害”运动中右派孟昭英教授上树打麻雀时，他沉默了很久。

梁先生对当时南京工学院的童寓、刘敦桢、杨廷宝三位同辈大家怀有极高的敬意。我从他那里也听到一些有关往事。

在东北大学办建筑系时，梁先生曾与童寓先生默契合作，自己离开沈阳任职营造学社后，曾请童先生代理系务。日本侵占东北后，童先生带学生入关去上海完成学业，梁先生也曾给予支持。解放军刚进清华园，北平尚未解放时，梁先生就函邀童先生赴京共事，一起建设新北京。

杨廷宝先生和梁先生在美国宾大就读时就是同门师兄弟，梁先生说杨当时是“内韧外秀”的模范生，是他钦佩的学长。梁先生归国时，杨先生推荐他任东北大学建筑系首任主任。

刘敦桢先生和梁先生是营造学社文献部和法式部的两员主帅，关系融洽。抗战后期，刘老离开李庄去重庆任职，分手前两人促膝谈心到深夜，临别时两人抱头痛哭，依依不舍，梁先生后来每次去重庆“化缘”筹钱，都会去看望甚至住在刘家。清华学生因此也都尊称刘敦桢先生为“大刘公”。

### 伉俪情深

梁先生也深爱着林徽因先生。有一天晚上我去12公寓，他正低头在抄写林先生的诗作。我开玩笑说：“梁先生想林先生了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如果她听医生的话还可以多活几年。”他说林先生是性情中人，重病在身本该卧床休息，但她固执，一旦有了灵感和创作冲动，不管多晚都会披衣而起秉灯疾书，一口气写完，甚至通



20世纪50年代初，梁思成、林徽因摄于清华园

宵达旦。梁先生说林先生写诗不完全为了发表，而是一种情感宣泄。

那天他从《诗经》谈到古诗和新诗的异同，举“橡栴之端，悉垂铃佩”，动情地背诵林老师生前的诗作《宝塔风铃》。

“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，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？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，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……”诗情画意尽在朗朗声中，他还说储藏室里还堆着许多林先生的手稿，自己没有精力，也没有人帮忙整理。

当时我很想自告奋勇帮梁先生，只是进修任务太重，实在没有时间，现在想来真是遗憾，其实整理的过程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。那天他还讲了很多林先生的趣事，说她在朋友中谈笑风生、滔滔不绝，使她赢得了众多朋友的喜爱。他说：“你别看我话多，在林先生面前我没有说话的机会，她反应之快让人无法插嘴。”他还夸林先生“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，静如淑女，动若狡兔”。当年野外调查时，男生不敢爬的梁架她都敢爬，“穿着旗袍就上去了”，任何有助于考证建筑物历史的线索遗迹，她都不会放过，再累、再险，她

都不怕。1950年代初，为了保护北京古城，她会顶撞领导、舌战群儒。梁先生不无余悸地说：“如果林先生活到‘整风反右’，不知道能否扛得过去？”

梁师受批判时，林先生身体已经非常不好，久卧在床，但她还一直关心、同情并支持梁先生，使他能够感受到来自家人的温暖。令梁先生难以释怀的是，林先生临终的前夜，曾要护士请梁先生到她病房，她有话说，护士因为怕影响梁先生休息，建议次日安排，不幸的是次日凌晨林先生就溘然长逝。梁先生不知林先生最后还有何牵挂或嘱咐，为此自责不已。

### 拉拉“警报”

1959年梁先生入了党。有一段时间我注意到他心事重重，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直到突然接到系里通知，要我和吴光祖参加一个少数人参加的生活会，听梁先生检讨和大家“帮助”他提高认识，最后校党委副书记胡健总结。我因不了解情况，没吱声。结束后我不放心，陪他走回家，一路上心情沉重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过了两天我去他家，他的情绪平定下来，谈起那天的会，我说，“挖根源”时有没有必要把家庭根源讲得这么细？梁先生说，他的检查是认真的，“挖根源”就必然要涉及大家庭对自己的影响，会涉及一些事。为了安慰他，我告诉他，我也犯过错误，“鸣放反右”时因为右倾，也被处分过，撤去我团支部书记的职务。谈到“鸣放反右”，他很快接过话题谈到1957年他也差一点“卷进去”，是市委领导及时警告了他，知道即将“反右”，所以在“鸣放”时就非常谨慎。

回忆当时，每天晚饭后，明斋东入口

设有鸣放论坛，许多教授和学生都参加，人很多，距离我住的新斋很近。一天晚上跑过去看，梁先生正在台上发言，我就挤进去听，只听到他讲自己拥护党的领导，“我就是但丁派，我就是歌德派。”所以我趁机问他，当年怎么想到要去参加这个鸣放论坛？为什么自称是但丁、歌德？他说，自从得到预警后，他开始替那些年轻人担心，于是决心去论坛拉拉“警报”。

以前我和梁师很少谈政治，这次坦率交流，使我们师生感情更加密切。有一次他感慨地跟我说：“人这一生不可能都顺，总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，人要遭过罪才懂得珍惜，倒下去也就完了。”他又说：“人有两只耳朵和两只眼睛，但只有一张嘴，意味着做人要多看、多听、多想、少讲。”这大概是他要与我分享的一生的感悟和教训吧。梁先生这些话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。

党和政府对梁先生一直是非常关心和保护的，他自己也知道，也非常感恩。无论哪次批判，他都会认真检讨自己，尽管有时会“过头”，但基本上都是严格要求自己，他始终是这个态度。细想起来，当年我自己受批判时，心态也一样，狠批自己以求过关。

### 永别

清华进修即将结束，系里曾征求我的意见，希望我留在清华。开始我犹豫，因为进修的目的是为了回去开课，留下有点说不过去，况且新学校才有发展的机会。当我把这些考虑告诉梁先生时，他表示支持我回到内蒙古，说：“呼和浩特离北京不远，有机会去看你。”梁先生在我临走之前向我交代了一个课题，说呼和浩特

和北京之间有个山西大同，一度是北魏首都，要我安排时间去云岗石窟研究一下希腊、印度、波斯等外来文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影响。

“文革”前期，我一直关注梁先生的情况，得知他被批斗甚至戴高帽、游街……想到他那瘦小的身躯，身上的铁马甲，怎能经得起这种折磨？我心中十分焦虑和不安，后来知道他遭难的时候，多亏林洙老师一旁照顾，为此我对林洙老师是充满感激的。

1972年1月9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我知道恩师谢世已是一段时间之后的事，悲痛难忍，写下了以下小诗以兹纪念：

鸿著传万代，泪血诉千声。  
引我青春路，今日恸恩师。

## 七绝·怀念虹进同学

○柏占山（1972级建工）

数载冰天又饮风，  
只为京藏两相通。  
而今雪域驰专列，  
微笑留存遗照中。

许虹进，1952年4月出生，建工系房2班学生，1975年12月毕业后自愿参加青藏线建设，1979年回京在铁道部工作，1983年至1986年赴日本进修，1993年至1998年在外企工作。之后创立欧风博雅工作室从事设计工作。2019年4月7日因病去世。